

书 品

(2007年第5辑)

徐俊 主编

中华书局

王叔岷先生学行简述

● 钟彩钧

一 治学诲人的生涯

叔岷先生一生治学，考据、义理、词章并重。幼时，承太老师耀卿公之庭训，固其根柢。及长，经傅斯年先生之熏陶，广其胸襟。孜孜数十年，未尝稍懈。

民国三年(1914)四月二十九日，叔岷先生出生于成都东郊五十里之洛带镇。七岁入小学。十二岁随太老师到成都，选读经传子史、六朝唐宋诗文两年。十四岁以后，就读华阳中学、联合中学高中部。二十八年(1939)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，在重庆高级中学教国文两年。三十年(1941)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。因避日机轰炸，文科所附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，疏散至四川南溪县李庄镇之栗峰，由傅斯年先生主持。叔岷先生初见傅先生，即景仰其气魄之磅礴高昂，才情之雄奇博大。叔岷先生告以计划研究《庄子》，傅先生谓当从校勘、训诂入手。叔岷先生初颇惊讶，既而埋头下三年苦功，实事求是，始知从前之好读《庄子》，乃浮泛之知识耳。经校勘、训诂之基础磨砺，由浮泛而进入笃实之境。三十三年(1944)中秋，撰就《庄子校释》五卷，附录一卷。此叔岷先生笃实之学之始，至今治《庄子》者，尚皆参考引用，钱穆先生之《庄子纂笺》引用最早亦最多。叔岷先生留聘史语所，《庄子校释》脱稿后，继续撰就《列子补正》四卷、《郭象庄子注校记》三卷。杨伯峻先生之《列子集释》引用叔岷先生《补正》之说亦最多。

抗战胜利后，三十五年(1946)秋，史语所迁返南京，叔岷先生续写《吕氏春秋校补》，尚未完稿，国共冲突，南京危殆，随史语所播

迁至台湾。所方运来之书籍古物，暂堆积于杨梅镇之仓库中，叔岷先生伏首于木箱上，将未完之《吕氏春秋校补》写完。是书出版后，尹仲容先生再版之《吕氏春秋校释》，几将其说全部引入。

傅斯年先生任台湾大学校长，三十八年(1949)初，叔岷先生由史语所应聘入中文系教书，傅先生命开校讎学，边讲边写讲义，阅八月完成《校讎学》一书。同时亦开《庄子》，当时听讲学生众多，他校教师亦多来旁听。春季台大杜鹃花盛开，有杜鹃城之称。叔岷先生讲授《庄子》，有轰动杜鹃城之盛况。叔岷先生继续推广写作，经传子史、六朝诗文之考校，著述益丰。然不执着于考校，更突破考校以探义蕴。惟恐沉迷于考校而埋没性灵也。

自1949年初到台大教书，1963年应新加坡大学之聘，任中文系客座教授两年。1965年回台大任教两年。1967年以后，复在马来亚大学、新加坡南洋大学及国立新加坡大学任教。1970年至1976年期间，成功大学及中兴大学曾先后邀请叔岷先生返台，出任文学院院长，叔岷先生皆婉辞。叔岷先生1981年自新大退休，回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，并在台大中文研究所任教。1984年自中央研究院退休，改任史语所兼任研究员。同时自台大退休，改任中文研究所兼任教授。虽退休仍继续撰述，曾占绝句云：“为惜寸阴退不休，驰光逝水信难留。捐书绝学翔佯去，愧读南华述孔丘。”盖《庄子·山木篇》述孔子闻子桑雎之言，徐行翔佯而归，绝学捐书也。

自写《庄子校释》以来，叔岷先生最见功苦之作，为《史记校证》十巨册，经十七年始脱稿。在美国哈佛大学访问一年之间，在台大及在新、马教学之余，即星期日皆未停笔。学生求见者问：“先生何时有空？”答云：“你来我就有空，你不来我就没有空。”此二语久久流传学生中。

叔岷先生少时所写之《庄子校释》，乃条举方式，未录全文。《史记校证》脱稿后，续写《庄子校论》，于1985年完成，共三册，较《校释》颇有进益。少时好读梁锺嵘《诗品》，曾于《学原》第三卷第

三、四期发表《锺嶸诗品疏证》一篇，因自感疏漏，于去年（1990）三月写成《锺嶸诗品笺证稿》巨册，了却多年心愿。此生重要著述大体告一段落。陶渊明诗云：“气力渐衰损，转觉日不如。”十年前曾在台大中文研究所讲授“先秦道法思想”，校外旁听者甚多，留有粗稿，叔岷先生云：如心力尚健，颇思整理成书。来日仅写单篇论文，当不至过于耗损神智也。

二 校勘训诂之学

叔岷先生以校勘之学著称于世，但这条路是叔岷先生进入北大文科研究所后，受傅斯年先生影响而走上的。叔岷先生原喜古典文学，喜写旧体诗，不免有才子气。傅先生第一次与叔岷先生谈话，就说：“洗净才子气！下苦功校勘《庄子》！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！”（《校讎别录》26页）傅先生的一番话，固然是对叔岷先生的陶铸裁成，也是出自他对学术的信念。傅先生在《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》中说，学问要见奔驰的发展，是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，随时扩大旧范围。最后说：“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。”（47页）由此，便可知他主张读《庄子》要从校勘训诂入手的道理了。

叔岷先生作完《庄子校释》后，继续把校释的范围推广至道家诸书，乃至遍及先秦诸子，与一部分的经书。

1959年写成《校讎学》，根据十余年的校勘经验，讨论校勘的方法和态度，并归纳一百二十二个通例，把校勘学建立成一门独立的学问。叔岷先生常谦虚地说：如有余闲，这本书还须补充修订。

叔岷先生训诂学的成果，除了散见于各种校证之外，有《古书虚字新义》一书，辑录吴昌莹、裴学海所未及者，计九十九虚字，二百二十六条新义，对读古书与古代语法研究有很大的帮助。三年前叔岷先生更将《古书虚字新义》扩充为《古籍虚字广义》一巨册，嘉惠士林。

叔岷先生年轻时便喜欢读《庄子》、《史记》、《陶渊明集》（《校讎别录》111页），于诸书皆下了多年的校释功夫，有专著问世。

叔岷先生论校勘工作的意义是：“（一）校勘古书，是一种小学

问,可以帮助研究大学问。(二)校勘古书,是一种支离破碎的小工作,可以帮助通大义、有系统的工作。(三)校勘古书,是一种绣花针的工作,可以帮助大刀阔斧的工作。(四)校勘古书,是枯燥无味的工作,有一种无味之味!”(34页)

叔岷先生叙述校证《校记》十七年的三种甘苦云:“一、平淡无奇。经常解决一些普通问题,只是一条一条地写下去,虽然不感到沉闷,也不感到新鲜。二、兴高采烈。有时解决前人不能解决或根本未注意到而又很重要的问题,比庖丁解牛后那种踌躇满志还要得意。三、忍气吞声。有时一个问题,想了很久,都不能解决,要放弃,又舍不得。要清理,又没头绪。真是有‘剪不断,理还乱’之苦!没办法,只有再慢慢想了!这三种感受,我想,凡是下苦功研究学问的人都经历过的,不仅我校证《史记》而已。”(124页)

从以上两段话,可以看到叔岷先生对校勘学这门专业,是怎样的付注心血于其中,耐烦碎、耐辛苦,以达于创获之乐。从傅斯年先生“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”的话来衡量,叔岷先生是真诚的实践者,一位符合史语所工作旨趣的学者。

叔岷先生谓治学当由浮泛而归笃实,复由笃实而达空灵。也就是不自限于考校,而进论义理。有《好学》诗云:“好学当由实入虚。由实入虚救破碎,虚由实得非空疏。谁能虚实为一体,鱼跃鸢飞乐愉愉。”(《寄情吟》24页)叔岷先生非哲学家,不作长篇大论,而在考校的基础上探究义蕴。这些发挥义理之作,如收入《庄学管窥》一书的各篇论文,及《先秦道法与儒家的关系》一册,或者散在考校之中,如《庄子校诠》各篇的引言及注释。但最令人敬佩的,却是叔岷先生能把儒家的诚笃、道家的超脱融入生活之中。如《此心》诗所云:“养生名利外,治学道儒间。穷达不求讳,此心常独闲。”(76页)此则绝非口耳之学所能至者。

三 性情

叔岷先生有《自足》诗:“一生勤治学,而我非学者。一生好写诗,不肯附风雅。风雅人何多,学者遍朝野。落落一书生,自足无

所假。”叔岷先生只肯做书生，是因为赋性淡泊，置身名利应酬热闹之外。大家都知道叔岷先生是最勤苦的学者，然而多一些接触的人，则会说叔岷先生更是真正的诗人。在进入研究所以前，叔岷先生的兴趣本在古典文学，爱写旧诗。以后从事校讎的余暇，仍然写了几本诗集。如今叔岷先生的著述事业次第圆满，可以有更多的闲情逸致游心于诗艺，可以说叔岷先生虽以校讎之业名世，其为学实是始于诗而终于诗。

诗人者，情之所钟，有与生俱来的才华与深情，但也有与生俱来的孤介。叔岷先生读中学时便有“龙性难驯思叔夜，凤音独啸慕孙登”之句（《欲去》，《旧庄新咏》16页），叔岷先生自笑为“浮夸”，然而自小卓然不群之姿亦可得见。叔岷先生不立崖岸，融化了孤峭高洁，故来往者多不觉。然而，若看老师于古人喜庄子、司马迁、陶渊明、林和靖、曹雪芹，于红楼人物喜林黛玉、妙玉、晴雯，便可窥见其中消息了。

绝俗者必孤清，须赖情以自解，叔岷先生有咏陶渊明、林逋的《至情》诗：“陶林孤介人，赖有情可慰，至情寓至交，何必为之讳，至情能忘情，此境谁能暨？”（《南园杂咏》6页）叔岷先生的绝俗在与世淡漠上见，深情在对傅斯年先生、王师母与旧友的怀念，以及对学生的爱护上见。学生有求者，无论学问、事业，叔岷先生必尽心力解答援助。叔岷先生深得学生敬爱，亦以学生为最大之安慰。

叔岷先生以为情是很高的境界。世上有两种最难辨的，一是义利之辨，一是情俗之辨（见《寄情吟》的《小引》及《情欲》，33页）。情欲如何辨呢？我想可以借用《庄子·德充符》的话，真情是“常心”，是“心未尝死者”。师母辞世后，叔岷先生迄未续弦，盖不以死生异其心者（诗集中有数首明志之作）。叔岷先生1981年返台后，索居蔡元培馆斗室之中，环堵萧然，而日日勤苦治学。凡此皆人所不能堪者，叔岷先生独能怡然其中，这便是情的境界。叔岷先生的诗作中对情的境界亦多言及。叔岷先生以为庄子是有深情的，如《自欢》：“忘情实深情，无待亦有待。纯白冀常著，于衷庶无悔。”

(《寄情吟》50页)有情然后安于寂寞,如《长伴》:“时拂尘心似镜明,寄情自许未忘情。花开花落殊无奈,长伴琴书慰此生。”(104页)有情然后念旧,如《忆旧》:“执着情怀眷宿因,如丝离绪结难申。庭前郁郁相思树,满眼黄花忆故人。”(11页)叔岷先生的诗中常以琴书连文,这不是随意的,叔岷先生幼习古琴,至今素琴在壁。叔岷先生说 he 很少弹,亦无意为人一弹。

张清徽先生称叔岷先生“情圣花痴”(《爱心》,《寄情吟》7页)。叔岷先生有爱花惜花的深情,除了阳台上的盆栽以外,蔡元培馆小丘上的杜鹃与茶花也常入吟咏。茶花是整朵落地的,叔岷先生的研究室有两钵贮满拾得的茶花,虽然干萎,却形状完好。此中有细心与趣味,且教人想起黛玉葬花的情景。从叔岷先生的吟咏,可以体会花的风华清靡与雅洁,如《新莲》:“一色浅蓝初出水,清香引兴久徘徊”(68页),雨中的杜鹃:“微雨湿清晨,杜鹃花更好”(《微雨》,81页),若九重葛则未能免俗:“无香空有色,可惜落凡庸。”(《可惜》,134页)叔岷先生有怜惜落花的诗,《不平》:“落花满地无人惜,攘攘熙熙俗世情。”(30页)《落花》:“落花偎草凝红泪,犹似依依变故枝。”(《旧庄新咏》19页)又以为花有隐操,有不知不愠的君子之风,《何须》:“去日明知不可留,何须今日动烦尤。四时代序花开落,吐尽芬芳无怨尤。”(《寄情吟》37页)《幽兰》:“幽兰生谷中,惟恐有人见。不采自芬芳,采之欲谁献!”(139页)

下面仅录三首诗,乃叔岷先生自写才情襟抱者,以为本文的结束。

《独对》:“绝世才华超世情,才情绝世益孤清。秋窗寂历秋思远,独对秋宵月正明。”(《寄情吟》3页)

《斯人》:“超卓与痴顽,由来异名实;如何独斯人,二者合为一?苟爱有所钟,终始有胶漆。亦能忘俗累,孤云任飘逸。淳朴融华靡,下笔何洋溢。著书百万言,阿谁以为质?册载历屯遭,怡然守寂谧。”(《南国杂咏》25页)

《天真》:“高风贞骨跨凡尘,煦煦温情亦解人。冬夏青葱松柏

性，怡然抱朴见天真。”（《寄情吟》119页）

受命为叔岷先生写生平，因对老师的学问略无所窥，又赋性质木无文，不足以发潜德之幽光，故在比次老师的经历之外，谨就老师的自述与诗作，以及平日见闻所得，略加纂辑如上。本文写作，承蒙黄沛荣学长提供资料，特此致谢。

（本文转载自《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通讯》第一卷第三期）

《王叔岷著作集》已出书目

《陶渊明诗笺证稿》	76.00 元
《列仙传校笺》	32.00 元
《锺嵘诗品笺证稿》	88.00 元
《庄子校论》（全二册）	180.00 元
《庄学管窥》	42.00 元
《左传考校》	76.00 元
《先秦道法思想讲稿》	52.00 元
《史记校证》（全五册）	580.00 元
《刘子集证》	49.00 元
《古籍虚字广义》	79.00 元
《校雠学 校雠别录》	86.00 元

李小缘先生与友人书信数则

● 姜庆刚

李小缘先生是我国著名图书馆学家，早年毕业于金陵大学，后自费赴美留学，获得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学士、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。回国后曾任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、东北大学图书馆馆长、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、《金陵学报》主编等职。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后，任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。1959年不幸辞世。家人根据其遗嘱，将其藏书、字画等文物全部捐献给南京大学图书馆。

由于小缘先生去世较早，加之各种社会原因，学术界对于小缘先生的研究多在其图书馆学的贡献方面，对于其书信研究较少，除郭沫若、朱自清、闻一多、顾廷龙等先生与小缘先生的书信已公布外，更多的书信多年来鲜为人知，实在是学术界的遗憾。

今年南京大学举办“李小缘先生诞辰 110 周年暨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成立 80 周年”学术研讨会，并举办展览，其中包括小缘先生赠给南京大学图书馆的珍贵藏书，以及众多近代学人信札。

笔者有幸参观此次展览，据统计，与李小缘先生有书信来往的国内知名学者有顾颉刚、陈梦家、赵万里、王重民、汤用彤、常任侠、吕凤子、雷海宗、萧公权、蒙文通、丁山、徐中舒、闻宥、夏鼐、聂崇岐、张维华、卫聚贤、蒋相泽、冯汉骥、翁独健、陈中凡、史岩、刘继莹、程千帆、徐养秋、韩儒林、孙次舟、裘开明、陈增辉、腾固、曾昭燏、钱存训、陈裕光、王献唐、李翊灼、卫聚贤、刘节、孙明经、刘铭恕、孙文青、蔡维藩、洪范五、严文郁、袁同礼、郑德坤、汤定宇、陈万里、刘国钧、陈长伟、商承祚、张继平、杭立武、陈恭禄、王绳组、徐益棠、柯象峰、吕叔湘等，而国外学者则包括贝德士、费慰梅、克乃文、傅吾康、叶理遂等。

由于小缘先生的友人书信数量大，涉及人物与事件较多，加之

部分书信散佚,使得现存的书信中有些年份很难断定,给整理与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。

虽然本人水平有限,但是有幸得到了很多师长及同窗的帮助,将其中部分书信整理出来,并略加注释,以方便读者阅读。由于书信作者均为学术界知名人物,不再专门介绍各位先生的生平,想必读者能够谅解。至于辨字与断句的不当之处,还望读者不吝赐教。信中所用纪年方式均为民国纪年,不再特别注明。

赵万里先生与小缘先生来往函

小缘先生赐鉴:

月前过京得聆海言并蒙惠赐贵所出版书二种,拜领之余,感篆无已,近维道履绥和,兴居多祐,为颂无量。拙编《大公报·图书周刊》沪版自十月起停刊,津版仍月出两期,有时出不定期。惟篇幅已减至六七栏,兹另邮寄呈该刊单页一份,计第二期至三十二期共三十一页,第一期因报馆纸版遗失未印,到请晒收赐教为幸。贵处学术消息及出版情形,便祈惠寄数则,藉光篇什,无任企祷。匆上敬请道安。赵万里再拜。十二月十七日。(吕)叔湘兄,暨贵所诸公,均此问候不另。

斐云吾兄惠鉴:

前蒙枉顾未及聚谈,殊为歉仄,乃又奉十二月十七日大函暨《大公报·图书周刊》第一期已入藏,单页自第二期起至卅二期止,各一份计卅一页不误,毋任铭感,除编目度藏,供众阅览,以彰高谊外,特函布谢,尚希源源赐寄,俾成全璧为荷。迩来学术消息异常沉闷,无可奉告,至为歉仄。(吕)叔湘兄等在此间一如往昔,希择念为荷,专此敬请大安。弟李小缘。37、1、31。

向达先生致小缘先生函

小缘先生道鉴:

白门解放想道履平安为无量祝,令弟国鼎是否获留沪读,

深以为念。此间尚好，北大照常进行，近两月来讨论学制改革，将来变动当不大，研究工作仍可进行，只稍改变观点，唯开会过多，几于无日无之，所引为苦耳。（刘）继萱兄想仍在宁，便祈代致勤拳为幸，率陈即叩道安。弟向达载拜。五月廿四日夜。

估计此信写于1949年。信中提到的国鼎是指李国鼎，李小缘（原名李国栋，字小缘）之弟，早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物理系，后赴英国留学，1949年去台湾，曾任台湾地区“财政部长”、“经济部长”等职，对于台湾经济起飞贡献很大。

汤用彤先生致小缘先生函

小缘先生：

奉读来示敬悉并已转达向君，向君初意本谓，贵所有特约研究员之设，先付稿费后交稿或无不可，今既格于成例而向君之书又未脱稿，此事只好俟以后再谈，特复即颂道绥。弟汤用彤顿首。正月廿四。

此信作于1940年，当时小缘先生任《金陵学报》主编，广泛征集稿件，请汤用彤先生转达向达先生，邀请向达先生赐稿。

王重民先生致小缘先生函

小缘先生史席：

敬奉手教，并学报一册，拙稿抽印本若干册，至感至谢！弟存稿虽多，殊少长篇之作。惟十年前在某刊曾发表一《王陵变文》，惜是残卷，近来始据另一卷补全，另作有短跋及校勘，贵学报如用以补白，当即清抄寄呈请教也。匆匆，即请著安。弟王重民顿首。六月七日。

吕叔湘先生致小缘先生函

小缘尊兄史席：

顷奉手教，经探悉，赵君住址为林森中路（霞飞路）四明里六

号北新书局，即请转达贵友。金大近况时亦在念，美国对华政策已由静观而变为敌视，已划入冷战对象之内，以后经济来源当更成问题，恐金大非在国内另觅基础不可。（徐）益棠兄伉俪近来如何？益棠前赐佳作，格于众议，未能接受，殊为歉仄。伯武、确杲诸兄近况亦均念念，见乞代致问候之意。此颂教安。弟吕叔湘顿首。十一月廿二日。

吕叔湘先生与小缘先生是多年的挚友，在吕先生困难时期，小缘先生热情邀请吕先生来金陵大学任教，吕先生在金大度过了六年的时光。根据书信内容及用纸为“开明书店股份有限公司信笺”推断，此信时间应是在1949年。

信中赵君似指赵景深，伯武指王绳祖，确杲指刘继莹。

钱存训先生致小缘先生函

小缘先生尊鉴：

上月底因来贵州省亲并送敝春内来暂住，匆匆已逾旬日。兹定明日返申，十日就沪，并已定妥十六日之 Marine Swallow 船位去美，下月初可到美域供职，行前恐不及到京面辞，以后得晤，尚乞时赐教言，是所至幸。前示《中和月刊》交换事，艺林书店愿照尊示办理，兹囑共交邮寄年刊换《吉金书目》二部，并乞即交邮寄还该店是禱，专此敬请教安。弟存训拜上。九月七日。

钱存训先生早年曾在金陵大学读书，并在抗战期间帮助小缘先生在上海印刷出版《金陵学报》，此信为钱先生赴美之前所写，时间是1947年9月7日。

聂崇岐先生致小缘先生函

小缘先生台鉴：

今晨奉手示，敬悉种切。附单所列六种方志，除《滇志》外其余五种哈佛均已购藏，至敝所代哈佛购书，向有存底，容当

嘱人将哈佛已有之方志录目奉上。关于《燕京学报》第二十七期，即遵嘱挂号寄上，大约需半月后方能到达也。《燕京学报》及各种引得经倭寇蹂躏，略有残缺，现正计划补印，惟经费有限，物价昂腾，能否在短时间实现，则系问题耳。此复藉候公绥。聂崇岐启。二月十八日。（36年2月22日收到）

迳复者：

顷接来函得悉，寄赠之书业已汇到，兹由上海商业银行汇下之邮费叁拾伍万元业已收到，特达即颂，李小缘先生年禧。聂崇岐启。十二月二十九日。

小缘先生台鉴：

昨奉手教，敬悉种切。陈观胜先生已于八月初到达哈佛，有事请迳寄 Prof Kenneth Chen Harvard-Yenching Institute, Boylston Hall, Cambridge Mass USA 可也。此复顺颂著绥。弟聂崇岐敬启。九、廿五。

聂崇岐先生当时在燕京大学工作，因为燕京大学与金陵大学都受到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，因而有很多学术上的联系。

夏鼐先生致小缘先生函

小缘先生道鉴：

承蒙惠借《考古社刊》第六期，无任感谢，兹已令写官录副，原书奉还，即请察收。又鼐拟参考钱庆曾之《隶篇》正续集，未悉贵所有此书否？尚乞查明见示，以便前来借阅。又敝所拟购买贵所出版品，书名另纸开列。至于敝所现有之出版品目录，亦附上呈阅，如有贵所未备者，可以交换一部分，否则亦拟价购贵所之出版品。琐事烦渎清神，容再面谢。专此敬请，研安。后学夏鼐谨启。八月十五日。

小缘先生赐鉴：

来示敬悉，敝所交换刊物，兹依来单检出奉上，即请察收。贵所互换刊物已收到不误，谢谢。《隶篇》已由友人处借到，承蒙代为检查，无任铭感。敝所所出之《中国考古学报》第二期（即田野考古报告）已出版，现仅收到样本一册，将来当奉赠贵所。专此奉复，敬请撰安。后学夏鼐敬启。八月卅日。

兹奉上本所出版品数种，用以交换贵所之出版品。计开：

《仓洋嘉错情歌》一册 《中国算学史》一册

《元秘史译音用字考》一册 《东北史纲》一册

《内阁大库数档书目》一册 《安阳发掘报告》二三四各一册共三册

《集刊》二本 一册 《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岁生日论文集》一册

以上共计十册。此致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启。八月卅日。

兹收到贵所交换出版品如后：

一、《浑源彝器图》一册

二、《历代著录书目》六册（一部）

三、《河徙及其影响》一册

四、《雷波小凉山 民》，一册

五、《金陵学报》六卷二期一册，八卷一二期一册，十卷一二期一册

以上共计七种。此致中国文化研究所启。八月卅日。

夏鼐先生当时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，与小缘先生有学术上的交往，并讨论交换各自机关的出版物等问题。

冯汉骥先生与小缘先生来往函

敬启者：

顷闻贵大学刊行之《金陵学报》廿九年份文史专号业已发

行，取材宏富，编排考究，极愿先睹为快，拟请惠赠一本，如需工本，并烦示知数额，赉即补奉，专此奉达，函希查照为荷。此致金陵大学。四川博物馆冯汉骥谨启。卅六、六、二。

汉骥仁兄大鉴：

奉贵馆六月二日函敬悉，《金陵学报》第十卷第一二期合刊最近始行出版，兹奉赠吾兄一册，敬祈指正，另一册奉赠贵馆，书寄华西大学交由闻在宥先生转送，希收到后见复为荷，专此顺颂时绥。36、6、18。

小缘吾兄勋鉴：

自复员年余以来，川人事倥偬，致久未致候，深以为歉。前忽奉手书，得悉故人近来佳况，深以为慰，承赐学报一册，昨已自（闻）在宥兄处得到，至为感荷。近来川中无事可述，而人造米荒已达顶点，现蓉之米价已较京沪高出三分之一，故多数人均思离去也，诸容后叙，专此即颂暑安。（徐）益棠、（吕）叔湘两兄前处代致候。弟汉骥谨上。

抗战时期，金陵大学、齐鲁大学西迁成都，借用华西协和大学教室、宿舍继续办学，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燕京大学部分师生也迁至成都，四校均为教会大学，又集中在一地，故学术交往频繁。小缘先生结识了很多学者，冯汉骥先生及信中提到的闻宥（字在宥）先生就是其中的两位。

以上书信人物多为图书馆学界与史学界的知名学者，内容以学术问题居多，并涉及到当时社会生活等很多方面，对于研究者了解当时的学术动态很有帮助。而其中很多学者的信札，从书法的角度来看，艺术价值也是很高的。

（本文在写作过程中，得到了汤一介先生和李小缘先生长子李永泰先生的热情帮助，谨此致谢）

关于《中国近代期刊汇刊》

● 汤志钧

—

《中国近代期刊汇刊》自 1991 年出版至今,已经十六年了,如今中华书局再版影行,并以新出《清议报》见赠,欧阳红同志还专电相询,回顾往事,感慨良多。顾问三人,顾廷龙、方行相继谢世,我也年过八旬,垂垂老矣,因草此文,以供参考。

顾廷龙先生自 1932 年燕京大学研究院图书馆系毕业后留燕京图书馆工作六年。1938 年,应叶景葵、张元济之邀,由京来沪,主持上海合众图书馆。解放后,历任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(即合众图书馆)、上海图书馆馆长。他除精通古籍版本外,对近代期刊也很关注。建国初,成立上海图书馆,除原来合众图书馆所藏外,还有报刊图书馆(原鸿英图书馆),以至徐家汇藏书楼等并入,近代报刊收藏已为全国之最。为了便于读者查阅,在顾老和当时文化局主管图博的方行同志策划下,于 1959 年起,组织人力,把近代期刊中哲学、社会科学方面有参考价值的汇录其全部篇目,以上海为主,再走访全国五十个图书馆,编成《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》,自 1857 年的《六合丛谈》起,至 1918 年止,约一千二百万字,“文革”前出版第一册,其余五册“文革”结束后据校样印出。至于 1919 年至 1948 年,也写有卡片约一百多万张,装成三十八个大木箱,“文革”时被整车运出,送纸箱回炉。顾、方二老每言及此,总是老泪纵横,情不能已。

方行同志早在解放前编辑《谭嗣同全集》时,就从合众图书馆

所藏《时务报》、《农学报》和《湘学报》中录取谭氏遗文。此后，又陆续从《湘报》、《亚东时报》录取佚文补入，《谭嗣同全集》增订本还专门编有“报章文辑”。

顾、方二老和我时相过从，近代期刊的搜集、辑印，也成为我们经常谈到的课题。

二

中华书局是国内著名的古籍整理出版机构，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，该局张静庐先生就写信给我，询问上海收藏《苏报》的情况，是否可以影行。这是他看到我在 1963 年《文汇报》上发表《苏报案的历史意义》后特地问我的，经查询，藏数不多，事随中辍。

1985 年，我从美国讲学归来，把在日本购得的台版《苏报》两种，还有《国民日日报》的影行本带给顾、方二老看。台版《苏报》有两种：其一是台湾学生书局 1965 年 5 月影行的光绪二十九年二、三、四等三个月的《苏报》；另一种是台版《中华民国史料汇编》之一，1968 年 9 月根据陈铁笙旧藏影行，收录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初一日（1903 年 5 月 6 日）至同年闰五月十三日（7 月 7 日），由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出版。《国民日日报》收录光绪二十九年六、八两月份报纸，也是学生书局影行。顾老对我说：“我已年迈，方行又忙，近代期刊的影行，多亏您了。”我的工作单位，和徐家汇藏书楼只有一墙之隔，经顾老叮嘱，给我查阅报刊带来方便。次年，我到北京开会，和中华书局总编辑李侃同志同在一组，向他提出此事，他同意了，从而搜编工作正式启动。但面临的问题还是不少。

首先是《近代期刊汇刊》的起迄问题。

从当时看到的资料来说，1857 年国内就有期刊出版，但大都是外国人主持，如《六合丛谈》(Shanghai Serial)，1857 年 1 月在上海出版，由英国人伟烈亚力(Alexander Wylie)主编，次年迁至日本。《中西闻见录》，1872 年 8 月在北京创刊，主持人是美国人丁韪良